

出

版

史

料

CHUBAN SHILIAO

3

邹韬奋著作

- 韬奋文集(三卷本)
经历
患难余生记(手写影印本)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以上为北京,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邹韬奋主编报刊

- 上海《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11日—1933年12月16日)
人民出版社影印(内部发行)
香港《生活日报》
(1936年6月7日—7月31日)
上海《生活星期刊》(共28期)
(1936年6月7日—1936年12月13日)
上海《大众生活》(共16期)
(1935年11月16日—1936年2月)
香港《大众生活》(共30期)
(1941年5月17日—1941年12月6日)
上海、汉口《抗战》三日刊(共86期)
(1937年8月19日—1938年7月3日)
(以上上海书店影印)

向韬奋学习

- 韬奋画传 曹辛之编
三联书店版
韬奋手迹 韬奋纪念馆编
香港三联书店版
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
复旦大学新闻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纪念韬奋 研究韬奋

- 韬奋的道路 韬奋纪念馆编
三联书店版
邹韬奋 穆欣编著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韬奋的流亡生活 胡耐秋著
三联书店版
韬奋年谱 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韬奋与出版 钱小柏、雷群明编著
学林出版社
邹韬奋著译系年目录 邹嘉骊编
学林出版社

出版史料 第三辑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

编辑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
出版 学林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

书号 7259·013

定价 0.60元



第三辑 目录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伟大的爱国者韬奋	胡愈之 (1)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徐雪寒 (2)
韬奋永留人间	钱俊瑞 (5)
邹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	于伶 (7)
韬奋同志与生活书店的编审工作	雷群明 (18)

巴金谈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 (20)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人和事——怀念陆圣泉	吴朗西 (24)
我所知道的“文生社”	李济生 (33)
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华水 (40)

{ 编辑 } { 生涯 } 王统照的编辑生涯	冯光廉 刘增人 (47)
---------------------------	--------------

《现代》的始末	施蛰存 (56)
《文献》月刊和风雨书屋	凡一 (58)
一家专业出版英语读物的书局——竞文书局	吴铁声 (60)
记尚古山房	郑逸梅 (62)

人物志 丁福保与出版工作	卢润祥 (63)
冯宾符与《世界知识》	郁进 (65)

马恩列斯著作在我国的传播(续)	吉少甫 (67)
-----------------	----------

回忆录	忆北方人民出版社	王禹夫 (81)
	记上海编辑人协会和《文化战线》	冯和法 (84)

关于郭沫若著作的被禁缘由 萧斌如 (8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
(1927.8—1937.6) 张克明 辑录 (91)

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三) 朱联保 (157)

来函 照登	关于太平书局的订正和补充	人和 (158)
	上海最早的画报究竟是什么	姚福申 (158)

扶 闻 · 书 话	列宁著作的早期中译文(广隶)(4)	第一部版权法是何时颁布的?(书 音摘)(55)	舒新城致书李劫人(王震)(55)	《伊索寓言》的译名(建 初)(39)	《父与子》漫画的出版趣闻(章德良)(46)	汉字究竟有多少? (庭录)(83)	《一角丛书》(洲札)(86)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最早刊本 (竹文)(90)	我国古代第一部民谣集(雨洛)(156)
-----------------------	-------------------	----------------------------	------------------	-----------------------	-----------------------	----------------------	----------------	----------------------------	---------------------

邓颖超题词, 纪念邹韬奋逝世四十周年

封二: 《生活周刊》小言论紧急号外

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人巴金、吴朗西像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部分图书封面书影

封三: 遭查禁的郭沫若部分著作书影

郭沫若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汉《中央日报》附刊上的讨蒋檄文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开去郭沫若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令

封面设计: 任意

题花: 王亚平

栏名篆刻: 储招明



伟大的爱国者韬奋

胡愈之

我真不相信，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已是韬奋逝世的四十周年了。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没有死，也不会死。我时时觉得，他仍像当年一样，天真、热情、诚恳，为人民群众在努力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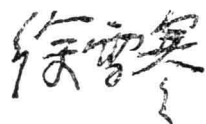
韬奋比我大一岁。我们相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一九三一年，韬奋在上海办《生活》周刊。我刚从国外回来，当毕云程介绍我与韬奋见面时，我对他为人之天真热情印象很深，但对他的抗日救国热情能不能持久，是颇有点怀疑的。与韬奋相识日久，我对他的观感便渐渐不同了。我发现他有一付硬骨头，立身处世不容有半点苟且；他对国家民族有着真正的热情；他从善如流，从不自以为是，自满自足；他嫉恶如仇，决不同恶势力妥协。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战士，真正伟大的爱国者。与他相识，使我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观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韬奋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新闻记者，拿办报办刊物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用自己犀利的笔“为人民作喉舌”，希望以此“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努力中”，作出自己贡献。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即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毫不动摇。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敌伪的顽固反动势力，韬奋就预言：这不过是“局部的黑暗”和“一时的逆流”。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得不爱我们的祖国！”号召“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为爱护祖国，为争取祖国的光荣前途，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必须明白努力的动向”。他坚信：“中国民族仍然有着她的光明前途”。他对祖国崇高的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获得了人民普遍的拥戴。

韬奋的大半生过着流亡囚禁、被追踪压迫的生活，他实际上是为救国、爱国而献出生命。为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处处以大局为重。他办《生活》周刊，遭受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最后，周刊被查禁，他本人也被迫流亡国外。回国不久，又因爱国入狱，被非法拘押八个多月。但是，抗战开始，他即捐弃前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这种光明磊落的胸怀，使得国民党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敬佩。

解放前，我曾经写过文章，希望在中国出现千百个韬奋。今天，韬奋所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实现，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然任重而道远。“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努力中，我仍然希望有千百个以至千万个韬奋涌现出来，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今年是韬奋同志逝世四十周年。缅怀往事，不禁心潮汹涌，不能自己。

韬奋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政论家、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现代中国史中最伟大的出版家。他的热情奔腾迸发出生命火花的如椽巨笔，和他领导创办的遍及后方与前线、国内和国外的生活书店出版事业相结合，才能使他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前后十余年间，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形成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宣传堡垒，在抗战前后时期，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发展。

韬奋经营出版事业，有正确的方向和指导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他自觉地把他的出版事业，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革命，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护拥戴，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深恶痛绝。当他的出版事业强大到足以妨碍国民党的统治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使用反动的两手政策对付他，一是收买，要和生活书店搞合营；二是收买不成，便封店捉人，一网打尽。韬奋软硬不吃，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五十余家分店，被封闭得只剩下重庆一家，韬奋眉头也不皱一下，辞去参政员职务，冒万死秘密出走，转移阵地，继续战斗。这是大智大勇者之所为，把十余年惨淡经营而形成规模巨大的出版事业，完全贡献给祖国人民了。韬奋说过，把他的出版事业，办成“有益于大众、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的推动力）”。韬奋这种不断求进步的思想，不但反映了韬奋一生的行为实践，也体现在他手创的出版事业中，并且确实成了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所使韬奋本人和他的出版事业，永生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事业、一个人，如果一旦囿于既得成就，故步自封，沾沾自喜，不能随着时代滚滚潮流，弄潮前进，那他就将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韬奋对他的出版事业的结晶——出版品，名曰“精神粮食”，对于自己的出版品，是高度重视，十分认真的。他的出版品在内容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对读者在思想上有启迪作用，教育、鼓舞青年在精神上得到滋润、补益，培育成才。生活书店前后出版杂志二十余种，著作和翻译名著近千种，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从来不出版无聊的、消闲性的低级趣味的作品，也不出版封建性、买办性的歌颂帝王将相、仁义道德和崇洋媚外的书刊。决不为了市场价值，为了骗取钱财，而降低出版品的水平。这些即使在现在看来，还感到是难能可贵的。他从来是把出版事业当作革命的武器、革命阵地严肃对待的。

韬奋深知要办好出版事业，要出好书，首先必须重视编辑工作。他把编辑比作“花匠”，精心培育奇花异卉，供人民大众品赏观瞻。他认为“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因此自己必须有甘当“无名小卒”，然后才能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得周到地道。世人都知当作家好，有名又有利，都低看了编辑，认为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韬奋却到死“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这种牺牲自己，一心为读者服务的崇高精神，正是全国千千万万优秀编辑工作者的集中表现。韬奋对编辑工作者有严格要求，首先要求编辑工作者应当“大公无私”，“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任何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他又说过“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编辑自己特别要根绝“情面”观点。就我所亲身知道的，韬奋自己一生，确实是这样实践的；向他所主编的刊物投稿、书店送著作，都不要托人推荐说情。或者像现在所说的“走后门”、送礼。他完全以文论文，以文会友。威胁无用，请托也无用。真正贯彻了编辑道德。除此之外，他要求编辑工作者要具有“敏锐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思想深入”，“有分析、组织及创造等要素的能力”。他要求编辑能“文笔畅达”，能改稿、能写稿。务使刊出的文章通俗流畅，深入浅出，能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总之，他十分重视编辑工作，对编辑道德和编辑能力有严格和正当的要求，这些无疑是正确的，是我永记不忘的。

办好出版事业，还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做好印刷发行工作，最终使产品能送到读者手中。发挥其“精神粮食”的作用。编辑、印刷、发行，是三者互相衔接，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韬奋对“造货”（印刷出版）强调计划性，认为“无计划最坏，因为无计划便无目标，更无所谓努力前进”。造货有计划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财力物力，千方百计缩短印刷周期，提高印刷装帧质量，努力降低成本，降低出版物的定价，并在经济上壮大自己，能更加广泛更加周到地为读者服务。生活书店采取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在抗战爆发前，它已形成遍及全国和港澳南洋一带的发行网，成为一切进步出版物的发行中心。生活书店的门市工作，尤其特色。抗战前在上海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做门市部，天天挤满了购买本版外版书刊的读者，熙熙攘攘，热闹异常，全上海书店中无出其右者。当时我国四大书店——商务、中华、世界、正中，都有宽大敞亮位于临街楼下的店堂——门市部，但每每门可罗雀，少人问津。抗战以后，生活书店随着战局的推移，它的门市部——分店，遍及大后方中小城市，所到之处，无不成为读者心向往之的所在。生活门市部的特点是：好书皆备，备书皆好，决不出卖任何政治反动或内容上无聊的书刊，决不提供有毒素的有害精神文明的“精神粮食”，开架陈列，便于读者翻阅选购，完全信任读者的人格和品德。工作人员都能做到韬奋要求他们的对读者应当“诚恳、热情、周到、敏捷、有礼貌”“不怕麻烦”，百问不厌，千方百计满足读者购买心爱读物的要求；甚至有的地方，把门市部办成阅览室，设置凳椅，供无力购买书籍、只能借门市部阅读的贫苦读者所利用。其用心之周到，令人钦敬。

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后，一九三〇年就设置了书报代办部，接受读者委托购买书刊报纸，协助外埠及海外读者解决购买书报的困难，并引导读者购买和阅读有益的书报，又给读者以九折或九五折的优待。由于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卓著的信用，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生活书店邮购户已拥有近五万户。这样，出版机构同读者建立了密切的直接联系，使进步的发行网几乎可说是无远勿届了。顺便说说，当时我们还通过生活书店邮购科的部份同志，把党所发行的巴黎《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情报》，递寄给某些邮购户，从而绕过了国民党的禁锢书刊的网罗。

韬奋同志领导下的生活书店，在一九三五年时，已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但他对于其他进步的力量较小的出版机构，却采取多方帮助其发展的方针。我当时受

党的委托,创办新知书店,去找韬奋同志,他就伸出援助之手,在资金上发行上给予大力帮助。抗战后,生活、读书生活和新知书店,形成亲密的战斗友谊。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三家书店亲密无间地互相合作,发展进步的出版事业,并共同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扼杀进步文化事业进行斗争。生活书店自然是老大,但它既无垄断意图,也无本位主义,一切以有利于革命为原则。这和韬奋同志对生活书店的思想领导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五年前后,在韬奋同志思想政治领导下、徐伯昕同志具体协助筹划下,生活书店已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完全新型的文化出版事业,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业务上是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在经营管理上是民主和科学的,这是中国自有出版事业千余年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这也是韬奋同志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方面,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切实学习的。

1984年4月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重新翻阅了《韬奋文集》(香港三联书店版)等书,但本文取材,主要来自钱小柏、雷群明编著的《韬奋与出版》,特此致谢。)

列宁著作的早期中译文

关于列宁著作的早期中译文,以前曾有张翊人、张静庐、张允候等同志撰文论述过;以笔者所见,列宁著作最早中译的时间尚可比上述几位同志所说更为提前。

早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就刊有金倡琴翻译“李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此文是从名叫 Crozies Long 的英译文转译而来的。金倡琴后来还在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建设中的苏维埃》,该文为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星期评论》周刊第十六期上,刊有戴季陶译的《李宁的谈话》,该文为“挪威政治家奔特福尔德氏”与列宁的谈话记录,是从同年九月七日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转译的,而该报又是“从挪威诺格伯拉特报译载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中国》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刊有郑振铎翻译的“李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这已由张静庐先生文中提到了,此处不赘。

(广隶)

韬奋永留人间

靳埃端

今天我们以十分沉痛和敬爱的心情纪念韬奋逝世四十周年。但是韬奋并没有死，他还活着，而且他将永远活着，永远以他无限光辉的形象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韬奋，正同我们党内不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辈一样，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前进，逐渐地转变为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的辉煌榜样。他一生战斗不息。他作战的主要武器是那由满腔热血凝成的笔。他的那支笔，比匕首、枪炮锐利百十倍，唤醒万众，横扫千军。现在还活着的中、老年干部和战士中，成千成万的人，就是受他主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以及他几百万字的文章的熏陶，觉醒成长起来的。由这大批的干部和战士组成起来的战斗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冲锋陷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韬奋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根据他访问苏联时所得到的印象，描绘了新中国的形象。他说：“他要为之奋斗终身的新中国的轮廓也不难想象出来：大家都有饭吃，大家都有工做。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个个都有目前大学生知识程度。中国只有国庆，却没有什国耻。中国地图上更不会缺着一只角。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独立自由繁荣的中国。”韬奋想望中的新中国，在包括韬奋在内的伟大革命先驱的引导、鼓舞和推动下，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已经基本实现了。而且正在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境地。这是可以告慰于韬奋同志的。

我们说，韬奋精神永垂不朽！什么是韬奋精神？总的来说，韬奋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加共产主义精神，它们两者高度和谐地和有机地溶合在一起。他热爱祖国，他毕生为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铁蹄下和封建买办资本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不怕苦，不怕死，颠沛流离，“早把生死置诸度外”。他在敌人的打击、威胁、利诱前面，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正气凛然，宁死坚持抗日救国。他对国民党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劝降和威胁，痛加申斥，说“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能做有益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声震宇寰，敌人丧胆。

韬奋对同志、对人民，则是那么谦虚、亲切，有人无我，公而忘私。他自奉十分俭朴，而对朋友，对同志非常关心，肝胆相助。他对同志的工作要求严格，有错就要批评。但他对自己要求更严，凡写文章，做演说，一字一句，推敲斟酌，绝无半点马虎。自己有缺点错误，逢人便讲，“这事我办错了，我立即改。”“我要向你学习”，“我要向你请教”，是韬奋的口头禅，而且确实这样办。他发现自己办的刊物上印有一个错字，或者，对那一个读者来信没有及时作复，他便着急

得什么似的，立即亲自处理。他组织重要稿件，总先把自己的看法同作者商量，然后请作者命笔。对作者来文要作重要修改时，一定同作者商量，决不强加于人。他对同事既严肃不苟，又和蔼亲切，有时夹几句笑话，令人心悦诚服。他对青年作者和读者尤其关心爱护，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增长知识，改进写作技巧。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韬奋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香港辗转来到新四军驻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那时他已经害上了不治之症——耳癌。我比他早两年多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到苏中，然后到盐阜区。当时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转移到淮南。我打了电报给他，说我将去看他。后因临时有项紧急任务，未能成行。后来听苏北来人讲，韬奋一到苏北解放区，心情非常激动，不顾病痛劳顿，参观视察，访问农户，勤写笔记。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请他讲话，做事报告，他虽然病痛加重，从不推却。他兴奋极了，感到生平从未有过的快乐。他认为与人民群众一起战斗，是他的天职。他在这里才看到了真正的民主，看到了共产党、新四军、人民政府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他从这时起才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的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青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病得那么重，而感到自己“变得年青了”，这样高的精神境界，不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合格共产党员是无法达到的。

我要特别指出，韬奋勤奋学习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从三十年代起，就同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有联系，从他们那里借来马列主义书刊认真学习。他在上海，在莫斯科，在伦敦，都精心阅读了许多马恩列斯的原著，并就近向许多人请教。他常向人作自我批评，说“我觉悟迟，不如你们。”实际上，从我个人同他的频繁接触中认识到，韬奋在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从民主革命战士到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他于一九三八年武汉时就正式要我作介绍人，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党的中央长江局认为他那时留在党外，对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战更为有利，说服他暂不入党；但党的组织一定把他当党员看待，决不见外。就他当时的思想情况来说，经过我们去说服他这样办，还很艰难呢。他那时只向我说了一句：“那只有组织服从！”并要我向博古、凯丰同志转达。

韬奋直到他在上海病床上临终之前的两个月还说：“我要尽快到延安去，争取入党，我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韬奋再次昏厥，醒来便口授遗嘱。其中一段说：“我死后，希望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情深意重，表现出一个真正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风貌。对此，我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唁电中指出：“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我们现在追念韬奋同志，就要学习伟大的韬奋精神，即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全力参与开创社会主义四化的新局面，并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奋勇前进！

一九八四年四月

邹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

——廿二年前危阨事 斯人不寿寿千秋

于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与九龙突然间处在空袭警报声、飞机轰炸声与大炮声交织的混乱中。战争来势之猛烈，人们的混乱和恐怖气氛的严重，比之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初期我所经历与经受过的更强烈得多。对于太平洋上将会有一场战争风云突变，原是近一时期来大家议论的中心问题。但是我们间搞军事评论的如杨潮、金仲华、恽逸群、张铁生、乔冠华等同志还没有估计到事变会来得这么快。美军的要塞珍珠港之被偷袭而毁，英国威尔士王子号主舰之被一击而沉，可见英美方面也是情报失灵的。

当时我住在九龙山林道。年青的顺德帮保姆阿妹仓皇从小菜场回来，交给我一张字条，是夏衍同志交给他的保姆转交给我的。说：他急赶过海去和廖承志同志等开会，安排一切去了，叫我们速作走的准备。

我急往九龙塘那方向走去，想找章泯和宋之的同志等，要通知“旅港剧人协会”的三十多位同志作准备。谁知往这方向越走越被拥来的逃难人群阻得无法前进。因为那边附近是启德机场，连遭日机轰炸，油库被炸在燃烧，九龙塘、宋皇台附近居民狼狈奔逃。我在狼狈中却突然遇见也在狼狈中的司徒慧敏同志。他讲：云姊（陈曼云，蔡楚生夫人，是潘汉年同志工作部门的一员干将）已经跟廖公通到电话了：“旅港剧协”同仁已经集合往尖沙咀码头去，准备过海到“华商报”（党报）再说。

他正在为他的一家老小想法作暂时的安顿。

午后，整个九龙更混乱了。我挤到“国讯社”去，这里有好几位名记者在，新闻消息必多。大家忙乱着在作种种文件的处理。恽逸群对我说：沿广九铁路进攻的日军已将突破新界战线。九龙失陷是一二天内的事了。港九轮渡下午起已经不渡九龙的乘客到香港了。原住在九龙的人怎么办？韬奋同志的目标特别大，于毅夫同志已经去告诉他了：党决定今晚一定要把韬奋全家弄过海去！这是我听到的最足放心的消息之一。

九日，天没亮，我们租住的一家屋顶平台上的小房间的门被叫开了。一位广东青年，自称阿梁，说是党派他来接我们两人的。连声说快！快！日用东西越少带越好，快跟他走！濛濛小雨天光昏沉中记不清走了多少路，我俩被阿梁推扶上了海畔的一只小木船。只见码头上几个烂仔（流氓）拦人抢劫，有人被推落水，有人被刀刺伤倒地。阿梁催促着开船。船开之后，我定神看时：同船的是柳亚子一家：亚老、夫人和柳无垢同志。柳老和夫人居然还认出了柏李，说看过上海剧艺社的话剧，说看过柏李演的“葛嫩娘”。船到香港，天刚大亮。有同志接扶着柳老等走了。阿梁同志指路叫我去找“华商报”馆。见到了昨天先到的“旅港剧协”的三十多人。惊魂甫定，空袭警报响了。跟着大家拥往“香港大酒店”楼下大厅去躲警报。宋之的抱着女儿小时，王萍抱着小男孩，卫禹平等照顾着他们。我和

柏李紧跟住章泯与小江，因为他们逃警报的经验多。这样，九日、十日两天之内几乎是在躲警报的紧张中度过的。夜间三四十人挤宿在“华商报”的一间楼面上过夜。大炮声中谁也难以睡着。

是十日中午的一次很长时间不解除的警报中，大酒店的厅内厅外挤满着几乎难于让人自然呼吸的人群中，廖承志和夏衍同志艰难地挣扎着跟熟人握手，招呼、点头。好不容易挤了过来，夏衍介绍了柏李。廖公风趣地对柏李说：等你来，等你来，你好大的派头：要敌方的大炮放礼炮欢迎，才来！好，我们还没来得及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倒先当了难民！说时摸了几张港币塞进我的衣袋里。说：“这算见面礼。打完仗，我们大大地痛饮黄龙！说话间，廖公被我们周围识与不识的人群中握手招手点头挤得不见了（因为柏李到香港只五天，廖公才如此讲的）。夏衍说：炮声一起，廖公就在这大酒店楼上开了个房间，用李约瑟，约瑟·李这个中西名字作掩护，跟各方面打交道，作安排，办了许多要紧事。今天他又要转移到别处去活动了。在警报解除声中，夏衍低声说了句：明天大家都必须作分散隐蔽了。我打听韬奋，夏说：韬公跟杨潮、杨刚、金仲华、俞颂华、恽老枪（恽逸群的外号）等作为一个陀（一个联系集体）；茅公由叶以群、戈宝老（戈宝权）等一联档，……

十一日一早，夏衍来到“华商报”对大家说九龙沦陷了，这里要赶快分散隐蔽。“旅港剧协”的同仁没有当地社会关系的，广东同志们正在分头找关系帮着解决。

我和柏李到湾仔“上海中国电工公司香港分公司”去躲避。这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三月十六日，我从上海被调来时，上海地下党蔡叔厚“老板同志”派人与我同来香港开设的。号称分公司实则小得可怜。在湾仔一家小西服裁缝铺后面租了两小间，一作绕编电线与线圈工场，一作经理夫妇与两个小孩的住处；附近另租了一间作为制造霓虹灯方棚

的车间也即是七个上海工人的住处。经理小朱是老蔡的夫人上海著名妇女活动家和《上海妇女》月刊编辑朱文泱同志的堂弟。朱经理夫妇对我们极为热情。整个香港激战的炸弹片炮弹片与高射炮弹的流弹横飞中，以及港督投降后，日军暴行和烂仔流氓的偷抢混乱日子里，小朱与上海工人们对我们掩护保护备至！这是我们铭感不尽的。

记不清是圣诞节与元旦节之间的某个早晨，我和柏李第一次溜上湾仔的一家小西菜馆吃点东西。刚坐定，卖早报的进来了。在我买报时，从店堂内室匆匆走出来一位身穿灰色法兰绒“唐装”（中国服装）的人，喊着：“报纸”这两个很道地的广东话发音，手里拿着“仙”（香港通行的镍质的伍分钱的分币）。买报的人多，还没轮到他时，他机警地注视着我，我也看出了他是没戴眼镜的韬公，相与做了个不易被别人发觉的而深相欣慰的表情，他拿着报纸进去了。我走出小店时特意回望了这个叫“菲列滨”的小西菜馆，记住了韬公隐蔽在这里。这是激烈的炮火中分散隐蔽了互不知道吉凶的多天以来第一个见到的熟人亲人韬奋同志！

报纸公布：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两小时可以自由通行。一个上午，我走呀走的总想能遇见一两个熟人。漫步到了跑马地，居然遇着了刘少文同志。他是遵义会议时的保卫部门的长征干部。上海沦陷为孤岛时期，是接替潘汉年同志担任我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主任和对外代表，同志间爱称他刘姥姥。这时在南方局港办工委工作。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亲人了。他问了我隐蔽的地址和柏李的情况。我告诉了他。蔡叔厚同志在上海的家即“中国电工公司”是他在沪时经常到的，他很熟悉。我也讲了邹韬奋同志隐蔽的小西菜馆地址。少文同志说所有同志们的隐蔽地方，都有专门分工联系的人。不过在这混乱中，我们的人也随时随地会遭受意外损失，致使被联系者失去联系。你我能记住韬公的地方

这很好，能补救万一。临别时，少文又再三叮嘱我万事小心，关怀备至。

一九四二年的一月七日上午，小潘同志（青年诗人、地下党员，这次战前，和我有过党刊秘密关系的接触。这时是党的最得力的秘密联络员。全国解放后，曾任我香港中国银行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的总稽核。）来通知我：经过廖承志、连贯、刘少文、夏衍等同志的周密安排，把民主人士和文化文艺工作同志分批撤到我东江游击区去。要我和柏李在两天之内，备好“唐装”，扮作难民，等他来领我们秘密撤走。

当天下午，夏衍同志来了。他胡子黄黄长长，穿着半旧的绸长袍，象个精干而文明的华人商店老板。说：金山找了本帮什么三教九流的关系，雇到一条大木船，偷渡出海，准备飘过伶仃洋，冒险往澳门登陆。已经约定了：广东人蔡楚生、司徒慧敏，还有他自己和金仲华等，人数还没全确定。问我怎么打算？我讲了上午小潘同志来传达的党的决定。他说也好，你们先到东江游击区吧。

八日上午，按照小潘所导演化妆的服装规格式样，我们到市场估衣摊上选购了各一套“唐装”回来。从炮声停息，日军占领以来，商店都不开张营业，街道及空地上不是赌钱团伙的赌摊，就是各种卖新旧衣服和日用品的大小地摊。当我俩走近湾仔的住处不远时，行人突然起了骚动混乱；一队日兵哇哇地走过来，后面跟着若干烂仔流氓一路在狐假虎威乘机为非作歹。我俩正在进退为难的时刻，只见云姐——陈曼云同志走进我俩之间，低声叫：蹲下！蹲下！我们三个立即蹲在路旁地摊边做着买日用物品的样子。云姐低声说：别怕，我有身份证！一阵混乱过后。云姐陪送进我们的住处。我讲了明天小潘来领我们走的组织安排。曼云讲了潘汉年同志在上海，为营救港九的同志们的一个苦心的冒险的传奇性活动：汉年和董慧同志是十一月下旬离开香港去上海的。十二月八日的事变

一发生，汉年就急派叶文津同志（广东人，日本留学生，一九三八年时曾任夏衍在广州主持的“救亡日报”战地记者。全国解放后曾任姚溱同志负责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的摄影记者。受潘汉年同志冤案株连被捕，坐牢廿多年，平反后落实政策，在广东省政协工作，未滿半年即不幸病逝的好同志！）动用叶父手中的大量日军“老头票”，取得特别通行证，以特殊身份，由上海飞到广州，雇了汽艇，赶到九龙。按照潘所记得的：住在九龙的若干民主人士和文艺文化界如柳亚子、韬奋、夏衍、于伶等人，从战火中接出去。可是就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二天内，廖公动员了几位广东籍青年党员，日夜冒险抢救，把原住九龙的许多人，都接到香港，分散隐蔽了。原住香港的如茅盾等人的家也都及时搬迁。叶文津只能把他所能找得到的：汉年的秘密工作班子和电台人员，安全撤往上海去了。廖公是了解这件事的。……我问云姐是否跟金山、蔡楚生、夏衍等一同去澳门？她笑着讲道：说我懂点日文，要我办好了身份证了，要我在这里当一个时间的“顺民”。说着：后会有期，依依而别。

九日黄昏时分，我们第一批“难民”，按照小潘导演的：一律改穿广东式工人农民的衣服“唐装”，扮作肩背衣被包袱、手提小衣包或藤筐。由小潘分批领着，通过日兵的几重检查岗哨与铁丝网架，悄悄地陆续到了湾仔的海边，由小木船渡到一条有点象“画舫”的大型游艇上。计有：韬公、茅公与师母、叶以群、戈宝权与小高、胡绳与吴全衡、恽逸群、黎澍、胡仲持、廖沫沙、殷国秀、柏李和我等等。连贯同志对大家面授机宜，介绍了“东江游击队”派来接应的便衣向导人员。说定：待黎明之前偷渡过海到九龙……等等。这是大家经过一个月的劫后重逢，各人都有着相同而又各不一样的惊险经历，可都只能低声交谈一两句，就各自分舱休息过夜了。我抚摸着韬奋身上这套灰色法兰绒“唐装”，低声学着他那一次说的广东话“报纸”二字。他笑着说是他

用一套西服跟那家叫菲列滨的西菜馆工作人员换来的。姓梅的老板待他很好。

十日黎明前，我们分头潜伏在四条小艇内。天亮之前到了九龙的“红磡”海岸，向导人员代我们对烂仔付了“买路过鬼门关”的所谓保护费。领着我们穿过日兵岗哨。到了窝打老道的一座楼房内，地下交通站休息、吃饭。交通站内负责的女同志们见到我们这群难民裹衣被的包袱不象样。买了灰的蓝的黑的几种布来，用两三架缝衣机代各人做了大包袱，还缝有长带子。又帮我们中的几位女难民化妆得尽可能更象难民一点。韬公活跃地首先背起包袱在室内练习走起路来，小殷小高等也学着样子练习。韬公指着要我当“难民导演”，要大家一起排演“难民逃难戏剧”。于是多数人背起包袱相互纠正着练习起来了。这时，向导说：一直潜伏在九龙未及过海去的叶籁士同志和老贺夫妇，明天将和大家一道走。

次晨，一月十一日，向导引来了叶籁士同志等之外的十几位男女同志归队。我们这一行人杂在成万的难民群中，沿着青山公路离开了市区。又换了两位新的向导人，领着大家走过荃湾镇，折上山陵小路，分在两处老家交通站内休息打尖，吃了顿红米饭后再走。进入了叫大帽山的山道间。翻过二三个山头，来到一个更大山口前，只见两位持枪的人坐在大石上注视着行人。大石前边放着一顶铜盆呢帽。帽内帽外的地上有着好些毫子（银的角子）、“仙”（香港的分币）和钞票。一位向导急奔上去对持枪的人交谈作手势。另一位向导对着队伍指点着我们的人数。大家紧张地艰难地翻越过山头到了一片乱石的斜坡。一块大石头上放着一只瓦茶缸和几只土碗。一位便衣大汉右手执盒子炮左手示意我们休息喝水。我们的向导员双手抱拳打拱地大声说：多谢！江大哥！于是疲惫的我们有的放下包袱用两拳敲腰背；有的坐在乱石上喘气；有的半躺着紧捏自己的腿肚子；有的前

去喝水了。谁轻声问了句：这里就是游击区了吧？谁应了句：唉，总算是到了！这时韬公的左脚扭了筋，右脚板底起了泡，而精神振作，不现出一点狼狈相。殷国秀接下他的包袱，扶他坐下；吴全衡倒来碗水请他喝，他推让着。不记得是谁说了句：请韬公当代表演讲，感谢游击区！韬公说：喂，可到家了！我身边的向导着急了，低声咬咬我的耳朵：是绿林好汉，土匪区！我一怔。韬公正把喝完水的碗放上大石块，立正，拉拉整整上衣，清清嗓子，喜悦地准备发表感谢演说的架势！我急步上去，碰了韬公一下，拿起大石上没人喝的半碗水捧给他；耳语：不是的！就说谢谢吧！韬公会意了，喝完水，大声讲：感谢江大哥！（鞠了一个躬）又说：谢谢！这时我们的向导已经在对江大哥热烈地拱了手，指挥大家起身再走。茅公夫妇始终是由叶以群和另一位向导陪着稳稳地走在队伍后列部分的。

下山的路，经过这次休息，好象容易走了些。只见江大哥身边多了两个也有短枪的人。走过二三个小山岗，是平坦的路了。我们这一行突然被前面的难民队伍阻住了。是两个烂仔在难民中抢劫东西，被带枪的大哥们缴了械，用绳子绑着走。而我们的队伍感到有点紧张，队列缩短而且整齐地加快脚步了。

黄昏时分，见着一座又高又大象是庙宇又象是座大别墅的庄院。向导领我们走进朱红大门去就地而坐。说是因为我们人多米不够，晚饭要等着，叫先休息。我们这群从无行军锻炼的大小文化人第一天居然也赶了七十多里山路，这时对于休息二字反应的强烈是可想而知了。

比我们先到这里的十几位撤出来的广东人员中间，有个熟人罗志雄同志找到我身边来谈话。罗是香港“大观影片公司”的粤语片导演、曾参加拍摄过我的话剧改编的“夜上海”。是刚入党的新党员。他讲：这里离汉奸伪组织的元朗大镇不远，当地人叫做杨家祠

堂，这座大建筑是一位“南洋伯”——往南洋做苦工发了财回来的华侨造的私人住宅。主人全家逃难走了。这房子就成了王大哥的司令部。王大哥是绿林好汉，这一带地方的统治者，很有点势力。国民党人不敢碰他，日本兵也一时难于对付他。我们东江游击队这次为了营救被困在港九的大批同志，跟王大哥打了交道，他才肯帮忙，接待我们过境，表示友好。继而低声说：王大哥在打听邹韬奋茅盾？该不该说？我讲：就说他们已经走过去了。罗说：你们今天才是第一批大队人马，他明白。我讲：那你就说听讲是由你们的广东佬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护送韬奋、茅盾走水路去澳门了。罗点点头。其实，这时，茅公正跟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在低声谈话。韬公正在用万金油涂抹他自我解嘲说的“蹩脚”呢。

第二天，十二日清早，两队人齐集在这座大得出奇的有着不中不西的彩色而庸俗的大壁画以及有字句古怪怪的抱柱对联的大厅之内，闲谈等待着。走进一位身穿新的皮夹克，插的左轮手枪，飘着红绸，文质彬彬的大汉。有人起立叫他王大哥。

王大哥对大家点头不迭，热情地大声问好，道辛苦、致慰问。说道：他已经派人前去探路，跟元朗方面的伪组织打交道去了。决无问题。请安心等等，保证诸位安全上路云云。说完，环顾各人时，特地对我点头而且连连招手，做了个请的手势。我迟疑了一下，跟他走出大厅，进了一间精致的厢房，大概是他的指挥部吧。他客气地让座、倒茶、敬烟，称呼我“邹韬奋先生”。不由我分说，他连声讲着：久仰！幸会等等客套话。我发觉他是已经错认定我是谁了。怎么办？在他连声叙述：如何爱看邹先生办的刊物，拜读邹先生的文章，赞成邹先生的言论主张，钦佩邹先生的为人，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很是光荣等等的滔滔时刻内，我只是局促不安，处于摇头不是，点头亦不行的尴尬窘境之中。心想：韬公为抗议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封闭各地

生活书店等种种罪行，愤而毅然辞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从重庆秘密出亡之后，反动派竟然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和搜索逮捕，而且悬赏重金，在任何情况下捉到他时，“就地惩办，格杀勿论”！而我现在面对的这位据山为王的大哥，听他方才说的对韬公心意倒象是真情的。可是政治分野难测。如果万一他手下有人把韬公扣留，献给广东省政府，或者交给日本军方，那将何堪设想！如若我坚决否认，那末真的邹韬奋就在厢房外面大厅内的三四十个难民群里。我只能硬着头皮：既不完全否认，也不完全承受对方的尊敬，只是滑稽地用半吊子广东话跟他周旋。唯唯否否，支支吾吾，所应非所问地忽而讲国语让他听不全懂，忽而又半句一句地用广东语跟他顺机应酬着。也时而穿插着恭敬地回敬他香烟等动作。幸而我们的向导同志发觉了、急了，冲进来嚷着：出发，上路，走！一手跟王大哥打招呼，一手扶我到大宅院前。韬公正在等待集合的人群边跟小殷小高们欣赏篱笆上大丛大丛开得正旺盛的红色黄色的炮仗花呢。我有意奔到队伍前面，回头对跟来送行的王大哥拱手告别。刚刚扮演了这一幕真假韬奋的惊险滑稽戏剧，大概还在心有余悸的表情中，被叶以群感觉到了，担心地注视着我，我只当没看见。上路走了一程，休息时，我才悄悄地对胡绳与以群讲了个大概。胡绳说：他是跟韬公一同乘公路汽车从重庆流亡到湖南衡阳的。韬公当时虽然也换了装束，可是六天的行程中，曾几次被好心的对韬公崇敬的青年读者辨认了出来，幸而不曾出事。以群说：这里是山大王，可不比青年读者们，危险！我讲：连山大王也如此尊敬韬公，足见韬公的品格与行为感人之深而且广。那我这个假韬奋也沾了光了！谨慎的以群说：可得小心！

继续走了很久，到了元朗镇旁。队伍停在路边，不进市场去，等到来新的向导人员，说是已经领有伪组织开的过境难民证明

条子，这也就是王大哥所讲的派人跟伪组织打交道的结果了。新旧向导员领着我们沿宝安深圳公路方向走去。不时有日本兵卡车从身边开过，也有日本兵对我们这群难民叽叽咕咕或者哇啦哇啦叫。我们在向导的示意下只是闷头赶路。天黑时到一家破旧而空荡的大房子里住夜。说是已经在宝安境内了，离我们的“家”游击区不远了。因为疲劳，更因为近家了，大家睡得很“死”！

第二天，十三日一早就排好队立在路边，等了又等，等了好几个小时，才见一个伪乡长领了四个荷枪的日本兵，对我们列好的队伍点数之后，才挥手叫走。由两个日兵走在队首，两个押在队伍后头走。不时听到日兵的嘻笑声。大家很紧张地被押送了大约六、七里路，到了一条大河边，日兵回去了。大家刚放下心来时，懂日语的叶以群才慢吞吞地说：押送的日本兵们议论：我们中间有几位花姑娘大大的好看！这下，几位女同志可大为紧张地相互对看着，庆幸过了难关！向导安排我们坐上三条木船，渡河上岸。没想到河岸边一个木板搭的哨岗前，三个日本兵持枪对着上岸的每位低着头走过的女同志仔细地盯看。幸而从元朗陪着来的一位新的向导员在用日语跟他们搭腔，同时交给他们一些钞票。另一向导领着大家快步直往岗峦起伏的小路奔走。翻上了一座林木茂盛的高山顶。向导说：大家安心休息吧！这里梅林坳，是我们的地方了！手指着山谷远处隐约可见的村庄。惊魂已定的女同志们欢呼了，大家笑了！韬公活跃地首先站起来远眺，小殷问他的脚病如何？韬公说：不“蹩脚”了，走，前进！有人和着说：进！有人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有人忘记了自己的包袱，向导捡来代他背着下山。

大家以到家的心情赶路，晚前到了宝安县的一个村庄白石龙。在一座已遭战火破坏了耶稣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游击队大队部的同志和村民们已经摆下了许多台凳和

大量的茶水接待。休息之后，有位同志来邀请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韬公等几位，由胡绳陪到大队部去了。大家在教堂内外吃了晚饭。副司令员王作尧的夫人领来妇女，把我们的女同志们接到村民家去住。老恽、黎澍、以群、沫沙、胡仲持、叶籁士和我等人被领到村边小山岗上的空小庙里当游方僧挂单住下。大队政委尹林平同志特地来慰问了我们。这是在东江游击队里我们过的第一夜。由于兴奋欢欣和对党的如此苦心安排营救，大家把几天来偷渡离开香港和一路上的奔波疲劳都忘掉了，连十八天战争中的各人遭受之苦也不谈了，只是谁也不能入睡。谈着方才林平政委讲的：是廖承志同志早在香港总督还不曾挂白旗、香港沦陷之前，就冒险来到东江跟游击大队部商定了营救的计划开列留下了他所能记忆得出的在港九的同仁名单等等。

第二天上午，在大好的南国暖和的太阳光下。大队部把昨晚到来的同志们——已经不再是“难民”了，集合到这个小庙前的大片空地上，中间一张桌子上摆有当地土产的蔗糖块、糕点和茶水香烟等。东江游击大队司令部的领导人，开会欢迎我们这第一批到来者。尹林平政委、曾生和王作尧两位司令员等领导和大家见面、慰问。大家围着桌子或立或坐地亲密交谈。韬公做了朴实纯真深沉动人的长篇发言。小殷说：韬公这席话，要是前天在大帽山对土匪大哥讲，怕要出危险的！

当天又接来了一大批人。我们转移到附近山林的几个草寮中住了。接着是天天有成群结队的人员被接进来。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文艺工作者分批分批接进来了，胡风和宋之的两家、章泯、小江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三四十人无一损失地安全进来了。香港的爱国侨领、著名教授与医生、国语与粤语电影工作者纷纷进来了（其中有陈铿然、路明姊妹等等）“生活书店”、“新知”和“读书生活”等出版社的大批职工由徐伯昕与胡耐秋等同志领着

分批进来了。我所隐蔽寄居的“中国电工公司”的小朱经理夫妇背着抱着儿女与七个上海工人也被接进来了。还有许多大中学生与青年工人都来了。一直跟杨刚、乔冠华等有联系的外国进步新闻记者如：爱泼斯坦、培特兰等之外，也有外国侨民、英国逃兵也来了。连广东省长的夫人吴菊芳也被救进来了。先后共计达五六千多人！这真是一次伟大的抢救工作。

当时的东江游击队的战斗力量还是不很强大，周转于惠阳、东莞与宝安三县之间三角地带，处于敌、伪、顽的反动武装夹攻之间。完成了这样大规模的抢救工作，困难已经够重大了。而要保卫与供养这么多的非战斗人员，尤其是大批大目标的著名的民主与文化人士和著名艺术家，有的已是国宝，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恰在这个期间，大队部由于频繁的夜行军转移，电台损坏，无法向延安党中央请示报告。廖公秘密活动在粤北地区亦难于随时取得联系。大队部苦心周密的决策是：根据当前的紧迫情势与本人们的意向，作适当的分批疏散。例如年高望重的茅公夫妇难于适应随时突然立刻就得行动的夜行军转移住处，经过林平政委妥善的安排了安全行程，由以群、沫沙和胡仲持等陪护之下，先行离开了。柳亚子一家暂时去了梅县。胡风、杨刚、宋之的、袁水拍、徐伯昕等以及“旅港剧协”同仁较有公开露面活动的条件也就分散或分批去了桂林。稍后，我们到阳台山上住了一个时期之后，五四女运动家刘清扬和沈志远夫妇等也去了桂林。由恽逸群领着漫画家胡考等二三十人迂回转往上海。至于许多广东青年、学生、工人，以及外国人士等等则由游击区给予他们必要的条件公开过境走了。韬公夫人沈粹缜同志和子女四人也只能暂时隐居香港。

东江支队处于四面受敌的惠东宝三县交界的三角地间，要用较好较有战斗力的同志来保证保卫着“客人”们的安全，只能用小部

分力量分散对付敌人。大队部时时流动搬家，我们这些“客队”也必须“游击”。最为可恶的是对付“伙合鸡”（老乡们鄙视伪军的广东话）的扰乱。我们分住在山陵林木间的草寮间，每夜也轮流派人放哨。每有突然的情况就得紧急转移。黑夜里摸索，大雨中滑行；或钻进茂密的山林，或穿越刺人的菠萝地。这在从无战斗行军经历的年青力壮的同志已很困难了。（记得“旅港剧协”有位男演员北方人奚蒙，是心旷体胖的老实人。一回，黑夜里大雨滂沱中行军，曾接连滑跤摔倒过三十七次之多！幸未受伤，可已是浑头转向摔糊涂了）！韬公却始终精神饱满，行动愉快。行军中不许高声谈话，他常是低声提醒与照顾别人，有时还说一两句幽默话来鼓励同行者。新到一个住地总忙着看问同仁有否受伤，或者找点破旧的报纸来研究。晚间争着要求担任放哨的一员。说自己要补课：学习行军，补习战士生活课，要练习当成一个戎马书生！明显的对比：也有一二位骄娇的名人居然会说怪话，抱怨把他们接到这里来吃苦头，流露着上当了早走为妙的好……。还有位文学理论家一不高兴，把香烟头扔入山茅草丛里，烧了半座山林，费了多大的力量才扑灭！

这样紧张的一个多月内，我们移动住过惠东宝三县之间的七、八个地方的山林与村庄。可惜我今天已经记忆不起这许多广东话的有着特殊乡音意义的地名了。有几处可爱的老乡们和美妙的山光景色地方，往往刚才爱上就会在一夜紧张间告别了。二月间前面说的大队部谨慎地安排分送出了几批人员，韬公和我们这一大帮人加上又新到了几位，转移到了阳台山顶上。

阳台山，这里山连山，山深林密，高峰经常飘蒙在浓雾中。山谷间小片草地上搭有两座人字式竹屋架的大草寮，寮内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每寮可供二三十人睡觉和坐息。我们从山脚下的溪畔搬抬来一些石块，摆在两寮相对之间的空地上，小者坐人，大者可当